

小作坊随意回收，正规企业“吃不饱”

每年数百万吨废旧铅酸电池流向何方？



新华视点

新华社贵阳7月20日电(记者向定杰、肖艳、杨欣)近年来，非法收购、拆解废旧铅酸电池的案例屡见不鲜。“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废旧铅酸电池对环境污染严重，有的犯罪嫌疑人获利1000万元，但后续恢复生态需要花2000万元。

据业内保守估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铅酸电池达数百万吨。它们流向了何处？

“游击队”收集，小作坊加工

铅酸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车、通讯基站等领域，使用寿命一般在两年左右。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会秘书长刘勇介绍，我国每年“退役”的废旧铅酸电池约有300万吨。

废旧铅酸电池因含铅及铅酸液等物质，可能导致大气、水体、土壤严重污染，被国家列为危险废物。根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申请取得许可证。

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多个电动摩托车市场走访发现，有的商户对相关规定不了解，往往将废旧铅酸电池直接卖给无资质小商小贩。“以前有人开面包车来收，最近有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调查，我们才知道废旧铅酸电池不能乱卖。”一位经营电动车的店主说。

“一些大的店是我们监管的重点，难就难在那些小店面，这些个体户文化程度有限，也不愿花时间去清点登记、填转移联单，网上申报；他们把废旧铅酸电池当成了一般废品，谁出价高就给谁。”黔南州生态环境局惠水分局

副局长樊龙江说。

那些废品的“游击队”把收来的废旧铅酸电池送到哪里去了呢？业内人士说，其中小部分卖给了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大部分流向地下小作坊加工；这些小作坊把铅极板留下，酸液直接倾倒，不仅利用率低，而且环境污染风险大。

“最近随着铅价上涨，地下加工的现象有所反弹。”刘勇说，从“游击队”到地下小作坊，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地下小作坊没有环保等成本，利润丰厚，给的收购价比正规企业高。

去年5月，生态环境部通报福建一起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经查，霞浦县一加工厂未取得废旧铅酸电池处置许可就从事拆解熔炼；自2019年12月投产以来，共采购废旧铅酸电池130余吨，已拆解56.54吨，销售铅锭收入80余万元。

去年12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无资质回收利用废旧电瓶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据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对大量废旧铅酸电瓶拆解时，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销售非法炼铅所得铅锭的金额达到1亿多元。

今年5月份，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废旧铅酸电池非法回收处置案件。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黄某、曾某租赁位于吉水县某乡镇水泥厂内的一处厂房非法拆解废旧铅酸电池、提炼还原粗铅牟利。被当地公安、环保部门查处时，他们共拆解130余吨废旧电池，产生9吨多废硫酸水。经鉴定，非法炼铅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含铅烟铅尘、二氧化硫，其浓度分别超出排放标准的60倍、13680倍；同时，还对厂区内部和周边的土壤造成重金属污染。

正规企业审批环节多、流程长

铅酸液就地倾倒，停工一年气味仍刺

鼻……在2018年江苏查处的一起非法铅冶炼案中，犯罪嫌疑人回收、拆解废旧铅酸电池15000余吨，获利1000余万元，恢复生态则需要2000万元。

刘勇说，每年“退役”的废旧铅酸电池，经正规渠道回收的仅有30%左右。据业内人士估计，贵州省每年就要产生废旧铅酸电池15万吨，约180万个。据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省废旧铅酸电池回收利用企业有22家，年经营能力89.5万吨，但2019年只回收利用了6.35万吨。

记者调研发现，正规企业从事废旧铅酸电池回收，除了要求有许可证，还必须配套建设专用仓库、付出更高的物流费用，而小商小贩以及非法炼铅小作坊没有环保、税收等成本，做生意更有优势。这导致有资质的企业往往“吃不饱”，生存艰难。

贵州某工业园区内的一家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是全省最早一批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之一。“占地100多亩，设计年经营规模是5000吨。为达到环保要求，公司一直在技改，最近每年投入都在上千万元。”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那么多货，仓库很少能堆满。

铜仁市生态环境局碧江分局局长毛瑞起也表示：“现在环境准入门槛比较高，有规划环评的化工园区才能接受这些企业。但如果企业在收集过程中走规范化程序，利润空间就很低。”

记者查阅环保部门对业内一些企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现问题主要涉及未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按规定填报危险废物转运联单等方面。

多措并举提高规范收集处理率

当前，我国正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受访人士认为，在有关部门介入下，非法回收、拆解废旧铅酸电池的行为有所收敛，接下来应疏堵结合，不断提高规范收集处理率。

铅酸电池回收涉及环保、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单位。黔南州生态环境局惠水分局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杨卫华等执法人员建议，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机制，除纳入重点监管的企业外，下一步要聚焦小作坊的非法回收、转移、经营行为；通过拉网式排查、发动群众举报等手段，一旦发现坚决惩处。

“每块电池都有溯源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件。”毛瑞起建议，进一步健全电池回收体系，加大对电池生产厂家回收网络的考核，对电池回收予以奖励，反而要追究责任。

业内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简政放权。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中，已经对未破损的废铅酸电池在运输环节给予了豁免管理。一些干部表示，还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比如，对各地开发的转移联单审批系统，社会公众知晓率、使用率较低；而且由于环保部门人手短缺，往往难以做到及时审批。

“跨省转移的程序更多，企业根本等不起。”一些正规回收企业建议，国家层面应开发统一的转移申报系统，畅通废旧铅酸电池合法回收渠道；同时，完善相关补贴政策，扶持正规收储企业发展。

同心逐梦绘“疆”来

(上接1版)

这一幕，常见于新疆南部的各大绿洲城市。绝大多数工人几年前还是面朝黄土的农民，是产业援疆推动一大批制造企业落户新疆，为他们带来身份转变的契机。

仅以棉纺织业为例，截至2020年，新疆棉纺织产能已达2038万锭，占全国棉纺产能的17.6%，共解决60万人就业，成全国纺织业重要生产基地。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支持，更离不开19省市援疆力量引全国产业入疆的付出。

万里守望 心手相牵

山水一程，民生百事，对口支援新疆国家行动的巨幅画卷是各民族各领域交往故事的感人合集。

棠棣花开，枝叶相扶。“一个不落”的全面小康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根生长。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近1.7万援疆干部人才西出阳关来到天山脚下。祖国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各地援疆铁军接续奋斗，帮新疆各族同胞共圆小康梦。

2010年以来，1.5万余名援疆干部人才结对帮扶培养了当地干部人才14.5万余人。援疆各省市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既提升了新疆干部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更促进了边疆地区与祖国各地互动交流。

7月3日，徒弟古哈尔古丽给即将返回浙江宁波的妇产科医生黄芳戴上了少数民族特色的小花帽。

一年半以来，黄芳接诊孕产妇1200余人次，抢救肺动脉高压、急性心衰、失血性休克等危重孕产妇40余人次，接锦旗的次数已经数不清。“被需要是一种幸福。”黄芳还帮库车市人民医院妇产科规范临床诊疗，提升业务能力。

前后方联动，线上线下结合，全社会参与。援疆干部人才带来支援地的资源和技术，帮助受援地干部人才迅速成长。

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结对认亲1万余户，捐款捐物金额7440余万元，各地援疆指挥部还开展了点亮“微心愿”、青少年“手拉手”、融情夏令营、足球比赛培训等各种活动。各种形式的交往跨越数千公里。

自2018年11月以来，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前方指挥部和伊犁教育、邮政等部门共同开展苏伊两地青少年“万里鸿雁传真情”手拉手书信交友活动。

书信联系让青少年交流通上“连霍高速”。霍尔果斯市苏港高级中学学生阿依曼在给连云港笔友的信中写道：“即使没有亲眼看过，在你的一番介绍下，我仿佛身临其境。如果有缘，我必定会跨越山河去亲身体验，到时候你可别忘了要做我的小导游。”

援疆工作让受援地和支援地各族群众搭上“心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日益筑牢。

久久为功 共绘“疆”来

站在新起点，矢志新奋斗。

天山南北，各支援疆力量没有停步歇息，正马不停蹄地推动新疆实现高质量发展，大步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今年上半年，山东援疆帮助喀什地区落地项目132个，投资总额达200多亿元，形成了落户一批、签约一批、储备一批的良好态势，为后续援疆奠定扎实基础；

——在江苏援疆支持下，今年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入境中欧班列较去年同期相比提前7天突破3000列，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愈发耀眼；

——天津援疆选派18名干部人才到和田地区乡镇任职，推动乡村夜市建设、电商直播、村居改造，助推受援地乡村振兴。

援疆之初衷，是为新疆各族人民解难题，为新疆各族人民谋幸福。

盛夏时节，距离苹果采摘期还有3个多月。许多阿克苏地区的果农早就签订了供货协议。

前几年，由于运距过长，这里包括苹果在内的特色果品出现难卖、贱卖现象。

2017年8月，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的浙江省立足自身市场优势，推出“十城百店”工程，在省内10个市开设新疆特色农产品销售专卖店，帮助受援地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

第十批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朱林森说，“十城百店”将改造升级成“百城千店”，并通过天猫商城、云集微店等嫁接线上市场。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是新疆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深圳援疆推动深、喀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交流，实现两地青少年及家庭双向互动；湖南援疆引导援疆医生参与受援地“家庭医生”服务活动，在为患者干好事、解难事中增进感情；上海援疆持续开展文化润疆行动，以综艺节目为载体将现代文化引进喀什，并宣传受援地传统文化，增进双方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

以援疆为纽带，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美好画面，正在新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呈现，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每一天都在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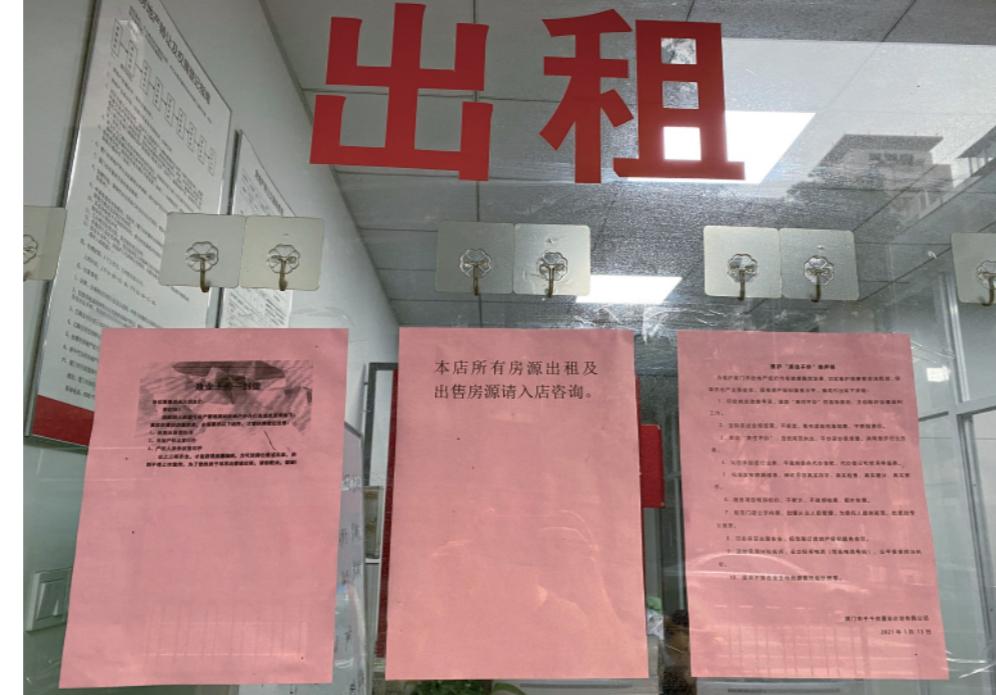
宁波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单继诚说：“新时代援疆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在事关长治久安的深层次问题上聚焦发力。”

国家关心，兄弟同心，“疆”来可期！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20日电

同比涨幅达15.89%，“领涨”国内二线城市

厦门房租“一路上涨”背后究竟为什么



厦门某房屋中介公司在门前张贴“出租”字样。 受访者供图

去年房租还是每月2000元，今年已涨到3200元……今年6月，厦门的住宅租金价格“领涨”国内二线城市

本报记者秦宏、颜之宏

厦门此轮房租异动受“旧改”步伐加快、租赁住房供需关系失衡、政府部门政策性租赁住房投入滞后等多因素影响

“闻风而动”的涨租潮

“2008年我刚到厦门时，一室户隔断的‘自建房’一个月租金是180元，到今年初租金是260元，12年才涨了80元。但今年4月份，房屋转手给‘二房东’后，租金一下涨到了600元。”在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某工厂的一线产业工人朱先生这样向记者描述近期厦门房租的涨幅。

朱先生现在月收入约为4000元，加上水电费，夏天房租开销可达1000元左右，占收入比接近四分之一，与自己刚到厦门时房租占比收入比不到十分之一相比，确实贵了不少。

“现在‘二房东’也不愿跟我签合同，房租涨不涨就是一句话的事。”和朱先生的情况类似，厦门一些租客也向记者反映了“二房东”不愿与其签订合同的情况。

有别于其他城市，厦门由“岛内”和“岛外”两部分构成，岛内的思明和湖里是“老城”，相较于岛外的海沧、集美、翔安和同安四区，社会资源和人口更为集中。

记者在厦门岛内暗访时发现，去年在一些地段以每月1000余元的价格很容易租到一室户“自建房”，也悄然涨到了1600元至1800元左右。

记者调查还发现，厦门此轮住宅租金上涨并不局限于中低端市场。厦门某房屋中介公司的李先生说，受何厝地块拆迁影响，他所代理的“海峡国际社区”今年迎来了租金大涨，一居室的住宅租金从每月6000元左右涨至7500元左右。此外，厦门岛内的高端

租下房源，在房屋租赁市场供应紧张时溢价出租。”厦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称“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家族式”整租房屋的“二房东”群体，在房租上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并引发了“一房东”要求涨价、周边租赁住房涨价等连锁反应。

地方政府对租房市场异动早有预判，但租赁市场关键信息缺失影响应对效率。“去年八九月份，我们会同公安部门在岛内拆迁地块进行调研，就预判了拆迁可能导致租金大幅上涨的风险，并提出加速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及时监测市场信息等意见。”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租房市场出现异动之后，他们曾联系有关部门对此进行干预，但对方表示要先提供相关信息。而在住房局的备案系统中，相关信息基本处于缺失状态。

此前，厦门市住房局曾按上级文件指导要求，下发文件指导转租住房10套(间)以上的自然人，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相关经营主体落实上述要求意愿不大。4月份以来，在厦门市有关部门牵头下，住房局联合多部门对重点区域“二房东”进行集体约谈，并对他们的房源和租赁信息等进行了采集。

政策性租赁住房分配“僧多粥少”，对产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照顾不足。今年5月，厦门市面向环卫工人、公交司机、公安辅警、城管协管员等基层一线公共服务人员和新就业本科毕

业生，投入1013套租赁住房，租金为市场价格的七折。“我们的收入也不比这几类人员多，为什么政策却照顾不到我们呢？”部分一线产业工人和灵活就业人员认为，他们对房租变动也很敏感，但厦门市投放的租赁住房资源却没有真正惠及他们，且投入数量也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从严打击恶意炒房、驱赶租客等行为

近期，厦门市有关部门加大力度增加租赁住房的房源供给。7月1日发布的《厦门市存量非住宅类房屋临时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实施方案》提出，在满足相关要求的情况下，允许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住宅类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缓解房屋租赁市场供需矛盾。

此外，厦门市住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加大房源定向精准供应，重点保障包括“不能或近期不宜转移至岛外的制造业和城市服务业的中低收入从业人员”等六类人员。

与此同时，厦门市还将综合运用行政、司法、金融、信用、税收等手段，从严打击恶意炒房、恶意推高租金、驱赶租客等行为；加强对串通、抱团涨价等扰乱租赁市场秩序行为的处罚力度，引导房东、“二房东”合理定价。

近年来，除厦门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都曾出现过短时间内的房租异动问题，如何在尊重市场供求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照顾城市新市民的切身利益，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施政智慧。

福州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认为，厦门此轮涨租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岛内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人口群居或聚居于岛内的问题。城市局部地区资源过于集中，形成对人口的“虹吸效应”，会导致局部问题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并带来连锁反应。他建议，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需各地高度重视，加快速度综合施策，合理疏散发展资源，逐步实现城市均衡发展。

“‘旧改’工作是当前不少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保证工作推进速度，同时也要把握推进的尺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黄璜认为，房租普涨等问题折射出城市中的新市民在政策制定中缺乏话语权，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公共政策制定前做好风险评估。“要建立理性多元的对话机制，尤其是对接城市弱势群体的对话管道，让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黄璜说。

同心逐梦绘“疆”来

这一幕，常见于新疆南部的各大绿洲城市。绝大多数工人几年前还是面朝黄土的农民，是产业援疆推动一大批制造企业落户新疆，为他们带来身份转变的契机。

仅以棉纺织业为例，截至2020年，新疆棉纺织产能已达2038万锭，占全国棉纺产能的17.6%，共解决60万人就业，成全国纺织业重要生产基地。产业快速发展背后，是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支持，更离不开19省市援疆力量引全国产业入疆的付出。

万里守望 心手相牵

山水一程，民生百事，对口支援新疆国家行动的巨幅画卷是各民族各领域交往故事的感人合集。

棠棣花开，枝叶相扶。“一个不落”的全面小康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生根生长。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近1.7万援疆干部人才西出阳关来到天山脚下。祖国六分之一的地球上，各地援疆铁军接续奋斗，帮新疆各族同胞共圆小康梦。

2010年以来，1.5万余名援疆